

V-6400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呼和浩特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丰镇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5 字数:91千

1984年10月第一版 1979年11月第二版

1986年6月第三次印刷

印数:10271—15270册

统一书号,11089·31 每册,0.74元

(内部发行)

编辑凡例

一、本选辑印行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特别是有关本自治区的史料，并推动征集和撰写工作的开展。选刊的稿件大部分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撰写者是从不同角度来叙述的，都不免有一定的局限性，内容可能不尽翔实，观点不可能完全正确，因此，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借供研究历史和地方文献者的参考。

二、本选辑所选的资料，主要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历史时期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宗教、民族、社会生活、历史人物等各方面的史实。撰写可以不拘体裁，不求完整，使用蒙汉文为主，必要时也可以使用其它文字，只要真实具体反映历史事件的真相的，均可选入。

三、本选辑所刊印的资料，欢迎读者提出补充和订正。

四、本选辑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对来稿的原意则保留不动。

目 录

关于阿拉善旗“小三爷事件”	卓力克 (1)
“小三爷事件”始末	罗永寿 (20)
准格尔旗魔王纳森达赖的生平	奇天祥 (34)
抗战时期的“绥远调查统计室”和张庆恩	张富仪 (53)
帝国主义在呼市的一个间谍组织 ——“汉瑞洋行”的侵略罪恶活动	曹毅之 (94)
旧绥远省的三个“独立王国”	刘映元 (110)

附 载

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总结	(123)
--------------------	-------

关于阿拉善旗“小三爷事件”

卓力克

我父亲德钦一心诺尔布，汉名德毅忱，出身于阿拉善旗台吉（即贵族）阶层。弟兄三人，我父亲排行为三，当时人称“小三爷”。一九二七年旧历闰三月初三日，以我父亲为首在阿拉善旗发动了推翻王公制度的事变，因之人们称这一事变为“小三爷事件”。

从我开始懂事的时候，母亲就把关于我父亲闹革命的经过，给我讲过不知多少遍。现在我还有一位五十一岁的大姐罗雪琴健在人间，她对这件事情，也知之甚详。我为了郑重起见，又先后访问了熟悉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几位老先生，访问了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蒙兵第一路司令奇子俊的幕僚奇锦峰以及在宁夏驻防时的几位同志，才写成这个材料。现在分作几个问题来谈。

（一）阿拉善旗为什么会发生推翻王公制度的事变

首先谈一谈阿拉善旗王公制度的由来和当时的阶级关系。

阿拉善旗的系统属和硕特，为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萨尔

之后，七传至顾实青桑，他的孙子博贝密尔长统一额鲁特，称汗，原居阿拉木图（今苏联境内）、伊犁等地。博有子名哈尼诺颜洪果尔，又生五子，其四子名巴尔斯图鲁拜琥，清顺治年间被册封为彻辰顾实汗，以后据有青海之地，进兵西藏。其三子名阿玉什巴颜阿布该，号达赖乌巴什，生有四子，末为和罗理，即阿拉善旗台吉第一代祖先。和罗理原与准噶尔部噶尔丹博什克图同住一个地方，后来噶尔丹叛清，和罗理率部来到现在的阿拉善旗地方，奏请归顺，清廷照准，于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年）授照内蒙古四十九旗之例，置旗编佐领，赐印授札萨克，封和罗理为多罗贝勒。这便是阿拉善旗王公制度的由来。

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年），和罗理死，四十八年（一七〇九年）子阿宝袭位。阿宝幼居北京，为御前侍卫。尚和硕公主（俗称道克欣公主），授和硕额駙。于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年）率兵万人随军征准噶尔，为右卫将军、参赞大臣，后又奉命护送达赖喇嘛入西藏，统兵居四年之久。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青海罗卜藏丹津叛，奉调率部赴青海，晋爵多罗郡王。阿宝死于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当年次子罗卜桑多尔济袭职为札萨克多罗贝勒，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年）尚多罗公主，授多罗额駙。奉命从征准噶尔诸部，擒捕塔瓦齐汗和辉特部巴雅尔汗，以少众降哈萨克，歼灭克尔科斯诸部，追击阿睦尔撒那至俄罗斯境。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年）罗卜桑多尔济晋位为多罗郡王，授参赞大臣。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年）平定准噶尔和回民叛乱有功，晋爵和硕亲王。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更诏命“世袭罔替”（这个诏命只限于被清朝皇帝认为有特殊功勋。

者，即在清朝宗室王公中，也不易多得）。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年）罗卜桑多尔济死。以后六传至塔旺布鲁克扎勒，七传至达理札雅。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阿拉善旗的历代王爷是多么“忠实”于清朝，曾在镇压国内的少数民族叛乱中，东征西战，立下“汗马功劳”，因之被清朝皇帝两次招为驸马，晋爵至和硕亲王，并“世袭罔替”。同时在北京还修建有驸马府——罗王府，阿拉善旗的王爷们，多是长年居住在那里，既享有和硕亲王的俸禄，又拿上剥削阿拉善旗人民的钱财，由他们大肆挥霍，真是备受恩宠，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由此也可以看出阿拉善旗的历代王爷和清朝的关系，是怎样的亲密。而这种关系愈亲密，也就使阿拉善旗的王爷们，更肆无忌惮地去剥削和压迫本旗的劳动人民，从而使劳动人民所受到的痛苦，更为加深，为其他各旗所未有。例如阿拉善旗的“乌拉”制度，是对于牧民最苛重的劳役负担，特别是当王爷、福晋及其亲族进京或回旗时，征用“乌拉”的规模，比其他旗都大。如系王爷、福晋进京，从定远营（现巴彦浩特）到磴口间，要设有十四个驿站，三十里一打尖，六十里一住宿。每驿站设有“达木勒”一名，各站准备作厨房的蒙古包一至二个，王爷专用的特制蒙古包二个。每日午餐和晚餐均准备绵羊一只，专供王爷、福晋享用，水、柴则是用骆驼驮运。王爷所乘的轿子，叫做“四马轿”，或称“草上飞”，轿夫二十名，以其中之一为长，每四人一组，乘马扛抬，其余人夫在轿旁两侧乘马路随，准备换班。轿前、轿后又各有一名徒步的轿馆，以防备途中发生事故。王爷到达驿站时，“达木勒”跪拜迎接，献哈达请安，若各种供应都能

得到王爷、福晋满意时，则予以嘉奖，有时还赏给顶戴，否则处罚、鞭打。而“达木勒”为了使王爷、福晋满意并挣个顶戴，就都在牧民身上打主意，多方勒索。因之牧民一遇到这种情况，也就负担格外沉重。除王爷乘坐“草上飞”外，福晋随行时，尚有小车三辆，随着侍候的有随从、侍女十余名、厨师二名、勤杂人员四十余名、护卫兵丁二十余名，共需骆驼七十余头。王爷用的蒙古包，有专设的“额和如沁”管理，用骆驼驮运，但从住宿地驮到打尖地，须得王爷动身以后才能搬动，并必须能赶到王爷前头去作准备。这样前后翻腾，忙碌不休，时间的紧迫，可想而知。如果不能提前赶到，就要受处罚，受鞭笞。这些骆驼和人丁，都是由旗里摊派来的“乌拉”，谁摊着，谁头疼。特别是牲畜，这样跑一趟就完了，死在哪里扔在哪里，从不赔偿。象阿拉善旗王爷的这种威风 and 派头，在当时各蒙旗的王爷中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他是清朝的驸马亲王，所以才能够这样。但对牧民群众来说，王爷的这种派头和威风越大，却是给他们带来的苦难越深，蕴积在他们心里的怒火越大，因而表现在阶级关系上，矛盾也就越尖锐了。

其次再谈一谈塔旺布鲁克札勒继承王位后阿拉善旗的情况：

塔旺布鲁克札勒于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袭王位。第二年，即一九一一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八十多年的清王朝，虽然这是个不彻底的革命，而塔旺布鲁克札勒因清朝皇室的复灭，直接影响了阿拉善旗亲王的荣华富贵，仍然是深恶痛绝。但不久这个革命

被袁世凯篡夺了，袁世凯为了做皇帝，要保留封建基础，不仅使各蒙旗的封建制度均率由旧章，并且对蒙古各王公还晋爵授勋，大加资赏。这就使塔旺布鲁克札勒在阿拉善旗的王爷宝座得以继续保持下去，塔王也就忠实地依附了北洋军阀。北洋军阀利用这位清朝的和硕亲王，使他当上了北洋政府蒙藏院的总裁，作为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的重要代表人去反抗进步力量。如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孙中山到北京后，段祺瑞为了抵制国民会议，召开了御用的军阀分赃会议——善后会议，塔王就以蒙藏军民长官的身份，参加了这个会议。

塔旺布鲁克札勒对阿拉善旗的封建统治制度，当然是坚决维护，不容丝毫打动，不仅征兵、征税、差徭、“乌拉”未稍减免。而且由于清朝复亡后和硕亲王的俸禄告终，所有北京城罗王府里的浩大开支，完全由阿拉善旗的劳动人民负担，这就使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比过去更为加重。结果是旗民生活日益贫困，人口日益下降，更加深了劳动人民和统治者的阶级矛盾。而旗内有志之士，一方面看到这种情况，极为痛心疾首，一方面又受到国内外革命运动的影响，便认为阿拉善旗人民痛苦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存在，因此就要推翻，要改革，以至于发展成为当时武装的革命政变。这就是这一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当时国内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冯玉祥举行北京政变后，倾向革命，又率所属的国民军到达了西北地区，更对阿拉善旗这一革命事件予以直接影响。尤其是一九二五年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张家口成立，第三国际派丹巴同志（后曾任蒙古人民共和国革命党书记），国民党派李烈钧，冯玉祥派

张之江参加了成立大会，并推白云梯、郭道甫、包悦卿、伊德钦等为领导。这些领导人中还有的亲到阿拉善旗，开展推翻王公制度的活动，因而更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革命事件的爆发。

总的说来，阿拉善旗发生推翻王公制度的革命事变，劳动人民和统治阶级的矛盾异常尖锐，是它的内部原因，国内民主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是它的外部条件。

（二）阿拉善旗推翻王公制度的革命事变经过情况与失败原因

德钦一心诺尔布弟兄三人，长名齐米德爱林岑，次名恩克布音，德是老三。他自幼在家延师课读，及长通蒙汉文，并擅长绘画，所画《八骏图》较负盛名，在当时的阿拉善旗，算是出身于贵族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人和蔼，平易近人，广交游，很少有王公贵族的习气，因此群众都比较喜欢他，愿与他接近。德父嘉伦春旺吉勒逝世后，弟兄三人分析祖产，恩克布音所占独多，因此德曾先后数次前往北京，向塔旺布鲁克札勒请求予以公断，但结果仍只分得果园一处、土地三百余亩、铺房一百余间以及部分牲畜。以这些财产的占有，从当时蒙古王公贵族来说，是比较少的。也正由于此，才使他在以后能比较容易地接受革命道理，从事推翻王公制度的革命活动。

德钦一心诺尔布，曾充任阿拉善旗的副梅林章京、副管旗章京（按各蒙旗旧制，管旗章京及其以下由平民中选任）等职务。在正管旗章京休假期间，受王爷、协理的指挥，代

管旗的行政、司法和军事事宜。但由于他几次前往北京，一方面受到当时全国民主革命思想的熏染，一方面结识了郭道甫，使他逐渐认识到，阿拉善旗的统治者对当时人民的压迫与剥削过于残酷，因而不愿和他们同流合污，经常不到旗衙门参与政务。旗内每遇有重大事件，必须派人去找他，才来参加。尤其和当权派正管旗章京陈莽哈赖，貌合神离，深为陈所不满，并加以排斥。因此，他在当时已经成为有副管旗章京之名而无副管旗章京之实的在野贵族人物了。

一九二六年九月，冯玉祥的国民军退据到陕、甘、宁一带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白云梯、郭道甫、伊德钦等，在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敖奇尔（系苏联布里雅特自治共和国人）等七人（女三人）的协同下，来到阿拉善旗开展推翻王公制度的革命活动（据一位在巴盟工作的同志告诉我，一九五四年有一苏联专家到了阿拉善旗的巴彦浩特，曾和某一负责同志说：“我的父亲过去曾经帮助你们这里的德钦一心诺尔布闹过革命，不知道德家有什么人？”后来这位专家就被领到了达理札雅处去谈，所谈情况不详）。他们到了定远营后，首先即找德钦一心诺尔布和田协安进行联系，经秘密商议后，决定尽速发展革命组织，建立革命武装力量，准备夺取政权，并吸收孟雄、罗敖有参加革命事变的领导。孟、罗经德钦一心诺尔布和郭道甫的影响和争取，不久便被吸收进来。

田协安、孟雄、罗敖有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呢？为什么能和德钦一心诺尔布结合在一起呢？

田协安，本名田济，先祖是随清朝皇室的公主陪嫁到阿拉善旗的“腰户”。腰户中有种田的花头，也有执役的太监，

名为“满洲人”（阿旗群众称为满吉坤），其实都是河间府、保定府一带的汉人。他自幼随父亲在阿旗王府当差，因侍奉塔王，常住北京，吸收了不少新知识，是出身于奴才家庭侍候人的知识分子。孟雄原系甘肃省秦安县人，业裁缝，因在原籍打死了人，逃亡到定远营。他手艺好，又善于交际，不仅对定远营的劳动群众有广泛的联系和相当信誉，并且取得阿旗王公贵族的欢心，由协理四公爷逐步提携他作了梅林兼听差处“达尔嘎”（即审判官）。罗敖有，蒙名嘎宁嘎，出身于台吉家庭，因系远支贵族，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他精于武术，喜爱狩猎，并会修理枪械，因在旗衙门学习，通晓公文，由一般“笔帖式”（即文书）逐渐提升到梅林副章京，充任全旗兵营“达尔嘎”，掌管全旗军权，但后来因生活入不敷出，往北京贩运鸦片，被塔王全部没收，因对塔王有很深的积怨。

从以上这几个人看来，一个是出身于侍候人的奴才家庭的小知识分子田协安，一个是出身于手工业工人兼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孟雄，一个是经济生活困窘并和塔王有私恨的罗敖有。他们与游离在封建统治集团之外的在野贵族德钦一心诺尔布，都比较接近下层并具有不满现状的情绪，再加以国内外革命思想的熏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苏、蒙顾问的启导，就很容易结合在一起，组织并领导了阿拉善旗的推翻王公制度的革命事变。

这些人结合起来后，为了发展武装力量，经进一步商定：由孟雄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秘密发展一部分盐务局、税务局、百货统捐局的比较可靠的税丁，作为组织商团举行武装暴动的基本革命力量。由罗敖有在阿拉善旗兵营中慎重地发展一些蒙古士兵，以便在武装起义时，掉转枪口，倒向革

命，镇压统治阶层的抵抗。并准备在革命事变成功后，做为组织革命武装的一部分骨干力量。这些工作，在分头进行中都很顺利。

此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白云梯、郭道甫等人，认为这一革命事变组织工作，已初步布置就绪，即偕同苏、蒙顾问秘密地离开了阿拉善旗，德等仍继续活动，可喜的是得到了冯玉祥国民军的有力支援。其经过情形是这样的：由于冯玉祥在北京驱逐溥仪出宫，不仅刺痛了清朝遗老遗少的心，更刺痛了与清室有极其亲密关系的塔王的心。因之塔王对冯衔恨甚深，到一九二六年四月间，国民军被直奉军阀战败，退入张家口、内蒙古一带，冯玉祥计划取道阿拉善旗前往苏联，但事为直奉军阀获悉，即授意塔王密令阿拉善旗衙门派兵在要路截击，如能将冯击毙，把人头送到北京，当酬塔王以崇优的政治地位，却不料塔王给阿旗的信件，被国民军军长门致中扣获，经向冯报告，冯乃改道赴苏。同年九月，冯回国在五原誓师后，进据陕、甘、宁一带，并将宁夏府制改为省制，派吉鸿昌任宁夏省主席，因未忘塔王阴谋截击之恨，便对阿拉善旗相机进行报复。一方面将阿旗磴口巴格改为磴口县，隶属宁夏省管辖，一方面给阿旗衙门去信，摊派骆驼七千只，步枪五百支，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即以武力对待。未几，吉鸿昌又借口办理由苏联运输枪械弹药事宜，要取道阿拉善旗，并派旅长赵景文率武装部队二十余人，到定远营驻扎。这些事情发生后，塔王和阿旗的管事人员，都惶惶不可终日，一再要求德钦一心诺尔布前往宁夏交涉。德至宁夏后，吉鸿昌即将他软禁省府，并声言作为人质，等阿旗将所摊派的骆驼和枪支缴足后才予开释。但第三天吉鸿昌突来勒

德参加革命，要以武力政变推翻阿旗封建王公制度，并在革命成功后，任命德为国民革命军蒙兵第二路司令。德闻后正契所怀，即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白云梯、郭道甫等和苏、蒙顾问来阿旗策动革命的经过，向吉报告，并要求给予支援，吉答应完全支持，将由苏联运来的枪支弹药拨给德一部分，组织革命武装。同时还因其派驻阿旗的旅长赵景文与阿旗统治集团有拉拢，恐对德的革命有不利行动，把赵调回，改派姚甲三（即姚连榜）到阿旗充任转运军火的监督。德亦随着回旗。

德回旗后，向旗衙门管事人等报告了交涉无效的经过，使他们很失望。间时姚甲三到定远营后，一方面对摊派的骆驼和枪支催缴很紧，一方面和德、田、孟等人过从很密。而协理罗希道尔吉，在赴姚的宴会后，又身死不明。这些迹象，都引起了阿旗统治集团的惊疑。陈莽哈赖在这时便派人星夜前往北京向塔王报告，请示机宜，并令副梅林章京黄·图门巴雅尔前往各巴格征集士兵，准备应变。塔王得报后，大为震惊，为缓和形势，争取时间，表面上提升德钦一心诺尔布为阿旗正协理，以示笼络，暗地里却令阿旗衙门中的亲信，尽速纠集各巴格、防卡的武装力量，对德等进行镇压。

到了一九二七年旧历三月初一日，德接到塔王任命他为阿旗正协理的命令，深感事出突然，立即和同志们密相研究，都认为一定是事变的机密，已为旗衙门统治者所侦知，故作此诱惑之举。现事不宜迟，为掌握时机，应出其不意，迅即发动武装政变。经商得姚甲三同意并联系好支援办法后，即于三月初三日凌晨，展开了震撼全旗的以推翻王公制度为目的的革命事变。

这个事变，主要分两个方面动手：一方面由孟雄把事先发动好的、经国民军武装起来而组成的商团（这个商团成员是定远营内盐务局、税务局、百货统捐局的一部分职员和大部分税丁），连同姚甲三所属的国民军，共集合起来有一百余名，由德等率领向阿拉善旗衙门展开进攻，很顺利地就把它占领。在占领后，即迫令衙门中的官员交出阿旗的印信，并包围了塔旺布鲁克札勒的王府；一方面由罗敖有把事先发动好的、在定远营兵营的一部分蒙古兵，即令其举行武装起义，进而解除兵营中其他蒙古兵的武装。在这两方面成功后，接着就分头占领定远营各要点，搜捕统治集团的人物，但除捕获陈莽哈赖外，其余协理、管旗章京、梅林章京等，均纷纷逃出了定远营。这一革命事变，由于事先有比较充分的准备，又得到国民军的有力支援，所以没有遇到多大抵抗，即推翻了旧政权，而取得胜利。

德等在革命事变成功后，立即采取以下各项措施：

第一、宣布成立“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由德钦一心诺尔布任主任委员。同时成立国民革命军蒙兵第二路司令部，由德兼任司令，孟雄任副司令，田协安任参谋长，姚甲三任监督（即政治委员）。司令部设副官处、军需处、军法处等组织，齐米德爱林岑任军需处长。司令部下辖两个旅，由罗敖有任第一旅旅长，敖齐尔任第二旅旅长。所属士兵由参加革命的商团和起义的蒙古兵为基础，并吸收了被解除武装的、不愿被遣散回家的蒙古兵。同时为了扩张革命力量，有利于展开牧区工作，还聘任了在革命事变中持中立态度，没离开定远营的原镇国公塔旺策林、镇国公米格瓦齐尔（均系闲散公爷）为顾问，副管旗章京罗·巴音都伦为参议。

第二、在定远营城内召开庆祝革命成功的群众大会，由蒙兵第二路参谋长田协安代表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向群众宣布：代表封建制度的塔王政权，已被推翻；由德钦一心诺尔布领导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政权——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宣告成立。同时还张贴了阿拉善旗王公制度已被推翻的布告。

第三、没收塔旺布鲁克札勒王府和阿拉善旗的财物，约价值五十万银元（其中有白洋十三万元、鸦片一万余两，余为珠宝玉器，古玩衣饰之类）。除截留一部分做为革命政府的行政费用外，绝大部分银元及全部鸦片，均上交给宁夏省政府。珠宝玉器、古玩衣饰之类，还运至宁夏省城举办展览会，使群众了解阿拉善旗历代统治者在生活上的穷奢极欲和对人民的剥削压榨罪恶。

第四、宣布了被捕获的统治集团的头子陈莽哈赖反对阿拉善旗国民革命的罪状，于三月初六日执行枪决。

第五、为了表示彻底反对封建制度，向全旗宣布废除“乌拉”制度，同时今后不准再留辫子。

革命胜利的消息和上述措施，很快就传到北京。塔旺布鲁克札勒听到后，失魂丧魂，捶胸顿足，几欲发疯，立即指示阿旗统治集团逃出定远营的人员，尽快组织各苏木、巴格的佐领、骁骑校、达木勒，率领全旗武装并胁迫牧民群众向革命政府进行反扑。这些人得到指示后，一方面在牧民群众中对革命政府进行恶毒的诽谤和诬蔑，他们造谣说：“德钦一心诺尔布叛变了塔王，出卖了阿拉善旗，抢掠了历代王爷宝库中的财物，枪决了管旗章京陈莽哈赖。国民军和商团在定远营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一方面恐吓牧民和

蒙兵说：“王爷对此大怒，命令你们为王爷效命，凡懈怠不前或同情革命者，将全家人丁尽杀无赦”。在这时，因革命政府在各巴格未建立起革命组织，并缺乏宣传，致一般牧民和蒙兵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因此便在统治集团的煽惑和胁迫下，听从驱使，向定远营进行围攻。南部各巴格的蒙古兵，由毛·巴图尔、范·布尔格德、杨·巴图孟柯等率领，截住了从三关口通往宁夏的道路，从南面逼近定远营；贺兰山各巴格的蒙古兵，由杨·嘎瓦率领，封锁了从樊家营子山区通往宁夏的小路，并逼近定远营；巴音乌拉和柴泥湖各巴格的蒙古兵，由巴图赛迪率领，从北面逼近定远营。这些武装部队在靠近定远营后，由原副梅林章京黄·图门巴雅尔任指挥，于四月八日（在革命事变后一个多月）向定远营攻城。在当时各巴格部队，人数较为众多，但由于所持的武器多半为土枪，效力不大，而被胁迫来作战的牧民，也不愿为统治集团卖命死拚，因此虽经过一昼夜的战斗，定远营仍然是安全无恙。统治集团见志不得逞，便撤至南北寺，计划对定远营长期包围。

定远营被围后，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和蒙兵第二路司令部派参谋罗·巴图（军需处长齐米德爱林岑之长子）取道山区小路前往宁夏，向宁夏省主席门致中报告情况，不料行至樊家营子，被杨·嘎瓦率领的部队击毙。以后又设法和门致中取得联系，门从宁夏派步兵一营，由彭营长率领驰援，但进至三关口时，却又被南部巴格部队截住，未能通过。门闻讯后，又从河套调苏雨生骑兵旅由镇木关越过贺兰山，冲破各巴格部队的防线，进入定远营，于是革命政府的防务，愈形稳固。